

● 哲 学

亚细亚生产方式与社会稳定^{*}

武 志 军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武志军(1968-),男,内蒙古准格尔旗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哲学系博士生,主要从事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

[摘 要] 亚细亚生产方式导致了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在十分强调社会稳定的今天,又有一些人重提亚细亚生产方式,认为中国传统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唯一法宝。这种观点虽然看到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对稳定的某种意义,但是它所带来的稳定只是一种静态的消极的稳定。真正的有利于社会长远发展的稳定应该是动态的稳定。要想实现动态稳定,必须从根本上改造亚细亚生产方式。

[关键词] 亚细亚生产方式;超稳定性;社会稳定

[中图分类号] B 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0)01-0039-05

一

19世纪 50年代末,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第 9页)第一次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在此前后,马克思又在许多著作中多次提到“亚细亚的”、“东方的”、“印度的”等术语,并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作出了完整表述。

在马克思看来,亚细亚所有制是原始所有制的一种形式。原始所有制,即“劳动的个人对其劳动的自然条件的原始所有制”^[2](第 470页)是覆盖整个前资本主义所有制阶段的所有制形式,它是一种财产属于公社集体所有、而归个人占有或使用,并且有了一定私有财产的公私二重性社会。这种二重性一方面“能够成为它的强大的生命力的源泉”,另一方面也能成为逐渐瓦解这种所有制形式的根源。“因为,一方面,公有制以及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使公社基础稳固,同时,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块耕种和产品的私人占有又使个人获得发展。”^[3](第 434页)同时,“公社内部就有使自己毁灭的因素”(土地

的私人使用和产品的私人占有),它的发展必将“破坏原始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3](第 450页)两者何者占优势,“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3](第 451页)。这种原始所有制虽然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出现过,但是由于不同的历史环境,它又具有“一系列原生的、次生的、再次生的等等类型”^[3](第 432页)。根据马克思的分析,这些类型大体可分为三种:一种是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它是“土地所有制的第二种形式”。在这种所有制下,财产(土地)不属于公社和个人,而是属于“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或“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在这种情况下,“公社却只不过表现为世袭的占有者”,而个人则“在事实上失去了财产,或者说,财产对这单个的人来说是间接的财产。”^[2](第 473页)私有财产只存在于家庭或独立地分配在劳动者份额的劳动中。马克思认为中国、印度、俄国都是从这种形式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是古代所有制形式。这是“土地所有制的第二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下,单个人的财产不像在第一种情况下那样本身就是公社财产,而是相反,个人在这里有了自己独立的财产。马克思认为,在这里,单个人的财产靠共同劳动来实

现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由于远离原来的居地,因而有可能进入全新的劳动条件并使每个人的能力得到更大的发展,“单个人变成归他和他的家庭独立耕种的那块土地——特殊的小块土地——的私有者的条件就越是具备。”^[2](第 475—476 页)古罗马城邦奴隶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第三种是日耳曼所有制形式。这是原生阶段的最后一种形式,也是再生阶段的第一种形式,它处于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过渡阶段。在这一阶段,农民表现为土地的实际所有者和占有者。

马克思进一步认为,上述三种所有制形式又可看作“两种形式”,即“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和“以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2](第 471 页),前者为“古代的”和“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后者为“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

二

马克思在历史研究中惊讶地发现:虽然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组和经常改朝换代,但亚细亚的社会结构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和结构,丝毫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马克思由此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即认为这种亚细亚生产方式导致了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

通过进一步研究,马克思发现,这种超稳定性有其积极的一面,即对国家的统一和凝聚以及对传统和民族性的发展延续十分有利。马克思还认识到,这种超稳定性不仅可以强化民族间的社会关系,甚至还具有同化外族的强大功效。他举印度为例,认为印度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将历史上曾经相继征服过印度的阿拉伯人、鞑靼人和莫卧尔人都先后同化了。

但是,马克思也清楚地看到,这种超稳定结构是静态的并且是通过文化封闭来实现的。马克思曾感叹道:英国侵华官员米契尔先生的话还是挺有意思的。米契尔先生说:“中国人的习惯是这样节俭,这样因循守旧,甚至他们穿的衣服正是以前他们祖先所穿过的。这就是说,他们除了必不可少的东西外,不论卖给他们的东西多么便宜,他们一概不需要。”^[4](第 59 页)

显然,这种稳定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所以马克思对这种稳定予以了无情的批判,他明确指出,在上述三种所有制形式中,只有亚细亚形式造成了“农村公社的最坏的一个特点,即社会分解为许多模样相同而互不联系的原子的现象”,“这种公社完全能够独立存在,而且在自身中包含着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一切条件。”因此“亚细亚形式必然保持得最顽

强也最长久。这取决于亚细亚形式的前提:即单个人对公社来说不是独立的,生产的范围仅限于自给自足,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在一起,等等。”^[2](第 484 页)

通过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历史分析,结合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我们不难发现,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超稳定结构有如下几方面特点:其一,是封闭性。在这种情况下,子系统具有小而全的特点,和整个系统同形同构同功能,从而自给自足自我满足,各子系统本身并不缺乏什么,各子系统也不可能从其他子系统得到什么新的自己所缺乏的东西。在社会发展中,虽然这可能最大限度地保持民族特质,但这和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所要求的开放是根本矛盾的。只要子系统仍然具有若干相同结构和相同功能,开放就没有任何意义,也根本无法实现。其二,是平衡性。这导致了易满足性和低满足性(满足于一种很低的要求)。由于缺乏多样性、差异性,由于低满足性,所以缺乏社会发展的动力,造成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格局。为此,必须形成一种非平衡机制,创造多余和不足,当马克思指出人类社会是不断创造自己所缺乏的东西形成整体的时候,无疑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其三,是中央集权性。它一方面使得个人变成机器,使其失去活力只能按程序机械行事;另一方面,它也使得个人或少数人的失误导致整个民族的灾难。特别是,它使得经济和社会各项活动难以实现自组织化。其四,是单一的国有化。它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将个人、国家、集体利益协调和统一起来,也不可能将责、权、利真正地协调和统一起来。

因此,长远地看,这种超稳定必须要以频繁的或大或小的社会振荡为代价。纵观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的历史不难发现,这些国家在历史上动荡的频率,是任何其它国家根本无法相比的。而且,当这些国家由于这种超稳定结构使其社会发展停滞或延缓时,这种超稳定也随时会面临崩溃的危险。所以,马克思才说亚细亚生产方式对许多征服者的同化,也是以其文明程度的高低为条件的。他认为,相继征服过印度的阿拉伯人、鞑靼人和莫卧尔人之所以被印度先后同化,是由于印度文明高于这些国家的文明。他认为,这种情况也几乎遍布于中国和俄国的整个历史。所以,马克思才强调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4](第 757 页)而到了 19 世纪初,相对于近代工业化国家的兴起,印度古代文明相对衰落了,它不但不再能同化任何“文明”的入侵者,相反,它自身的文化反倒被殖民文化同化了。类似的情况在中国也发生了。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华文

明已经不能同化任何外来的发达资本主义的文明

也就是说,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这种超稳定结构从长远的角度看,对社会发展不仅不利甚至是极端有害的。所以,马克思尽管对侵略者的行径十分痛恨,但就他们的侵略有可能打破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超稳定结构这一点,认为它“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4](第 67页)之所以是“仅有的一次”,是因为它是针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大多数亚洲国家最基本的超稳定结构的

三

当前,随着“冷战”在形式上的结束,许多国家都进入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稳定成了压倒一切的问题。特别是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如此。但是,对于如何才能更好地保持稳定促使社会健康发展,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一种在国际上广泛流传的思想认为,既然稳定是压倒一切的问题,那么,便应该借鉴亚细亚生产方式,甚至认为这是实现真正稳定的基础。而目前唯一保持这一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在亚洲也只有中国。因为只有中国才是亚洲没有真正被殖民化了的国家。比如,世界著名的历史学家英国学者汤因比教授和世界著名思想家、日本创价大学的创始人池田大作等就具有这样的倾向。汤因比认为:“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会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统一的政府在以前两千二百年间,除了极短的空白时期外,一直是在政治上把几亿民众统一为一个整体的。”特别是“就中国人来说,数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现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池田大作也认为:“现在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倒不是这种进步(指社会发展——引者注),而是稳定与和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式的统一也许是有意义的。”^[5](第 289—294页)

不过,汤因比和池田大作等也意识到了这种稳定的局限性。比如,池田大作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成功“就是意味带来和平。这的确是值得称赞的。然而另一方面,禁锢个人的创造性和自由、闭关锁国、固步自封的倾向也特别突出。”所以,池田大作认为,就算世界将来以中国式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统一,但“今后世界统一应走的方向,不是像中国那样采取中央集权的作法,可能还是要采取各国以平等的立场

和资格进行协商这种联合的方式。”因而,池田大作对中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心有余悸,认为“以中国作规范的作法,对短期时间的危险是更有效的。然而,也许会陷入更大的危险境地,也是在下赌注。欧洲方式也许要花时间,需要更顽强的努力,但我想没有大的危险。”^[5](第 289—296页)也就是说,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这种超稳定结构同时也隐藏着十分危险的不稳定隐患。

实际上,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一种农业文明的产物,与工业化和现代化有许多难以协调的方面,虽然它曾对许多亚洲国家的农业文明的稳定发展起过很大的作用,但也是造成大多数亚洲国家近代以来落伍的主要原因。而且,亚细亚生产方式影响越大越久,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水平就越低越落后。反过来,国家越落后,亚细亚生产方式就越有影响力,国家结构就越稳定。但是,由于国家落后,所以局部性的不稳定事件频繁发生,层出不穷。可见,想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来强化稳定是不可取的。由于没有带来经济和社会高速发展,亚细亚生产方式这种超稳定结构也就不会带来真正和长久的稳定。

在俄国,早在 19 世纪 50 年代,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及所有民粹派,都把农村村社制度作为一种社会主义的自然而然的基础来看待。赫尔岑解释道:我们所说的俄国社会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主义思想,它所依据的是土地和农民的日常生活,是事实上的份地和存在着的土地的重分,是村社拥有的村社管理,它以劳动者的组合去实现社会主义所普遍追求并得到科学证明的经济公正。他们的主张形成了俄国民族的落后优势论。他们认为,“我们是迟到的民族,但正是这一点使我们得救了。我们应该感谢命运,我们不曾有过欧洲式的生活。欧洲的不幸,欧洲的绝境对于我们是教训。”^[6](第 8—9页)因此,他们认为,植根于公有制和集体主义基础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对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最适宜的。他们“相信俄国生活的特殊方式,相信俄国生活的村社制度,由此相信农民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这就是鼓舞他们唤起数十数百人去同政府作英勇斗争的东西。”^[7](第 241页)

然而,落后毕竟不是优势,由于经济、文化、政治的全面落后,俄国的稳定根本不能真正实现,也就根本谈不上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离开了发展,任何稳定都是虚幻的。

相比之下,池田大作对欧洲方式的某些倾向性实际上代表了另外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为了社会的持续发展和真正稳定,必须用私有制去取代亚

细亚生产方式。这一观点的基本思想主要是想实现资本主义私有化。比较典型的是全盘西化的观点和资本主义补课说。这种观点的前提十分明显,如果说亚细亚生产方式同古代所有制和日耳曼所有制相比仅仅是由于没有私有制或私有制成分太少,那么,承认并确立个人私有制对于形成新的社会结构无疑是要优先考虑的。这种观点的论据是:中国在不根本改变亚细亚所有制的基础上进行的改革从来就没有成功过,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持这种观点的论者还认为,不仅在中国,近代以来,印度和俄国的一系列类似的努力也同样是失败告终的。他们甚至认为,连马克思也主张在共产主义社会要重建个人所有制。但俄罗斯和东欧的私有化进程表明,这种方式或许能够带来真正的稳定,但需要更多的时间,要以频繁的动荡为代价,因为在短期内它不仅不是稳定反而是极度的不稳定。

四

单纯以亚细亚方式或单纯以私有化来实现稳定都是不正确的。最为合理的办法就是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进行彻底改造。马克思对此有明确的阐述。马克思认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 1861 年所开始走的道路(指资本主义道路——引者注),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3](第 129 页)“在俄国,由于各种情况的特殊凑合,至今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的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马克思的理由是:俄国农业公社和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这使得它不必服从资本主义的活动方式就能够吸收其各种成果),它还度过了资本主义制度还没有触动过的时期;而且现在“不论是在西欧,还是在美国,资本主义制度都处于同劳动群众、同科学以至与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展开斗争的情况下。总之,资本主义制度正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现代社会的回复到‘古代’类型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生产的最高形式而结束。”^[3](第 431—432 页)

马克思的意思很明显,他将新的社会稳定方式理解为既跃过了资本主义体制的卡夫丁峡谷,又具有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特点的稳定。也就是说,未来的稳定方式既是亚细亚的,又是经过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改造并克服了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局限性的新型稳定方式。

马克思和俄国民粹派的观点不同的是,民粹派认为,不经过革命不需要无产阶级就能自然而然地进入到新的社会稳定;而马克思认为,这不过是返回到原始、粗陋的共产主义体制,返回到一种无发展或发展水平极低的稳定中去。马克思认为,虽然东方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就能取得资本主义体制所创造的一切文明并借此进入社会主义,但这种“跳跃”是有条件的,是指不经过资本主义历经的苦难而取得资本主义体制所具有的各种文明成果,包括吸收其先进合理的稳定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体制是不可能被超越的,总要有一些国家和地区要走这条路,就具体的局部范围而言,吸收资本主义体制各种文明成果的道路也是不能绕过的。这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上看得十分清楚,由于时间上的“钟慢效应”,空间上的“尺缩效应”,因而使得经济上具有了“同时性效应”,并产生了与广义相对论相似的“捷径效应”。这说明,不能没有积累而“跳跃”,“跳跃”必须要有一定的积累基础,积累是不能省略的,而这在开放系统下通过生产力的平移是可以实现的。这也就说明,必须要有现成的资本主义可供借鉴,必须要有一些国家已经先经历了那些卡夫丁峡谷的磨难。而且,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种超越一方面要充分体现公有制和集体主义体制;另一方面,又要同原始村社及亚细亚生产方式对个人的否定完全不同。他们认为,在新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体制中,“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第 295 页)马克思认为,这才是实现真正稳定的社会基础。

目前,对许多东方国家来说,利用国际和平大趋势全面改造亚细亚生产方式促进社会动态稳定已是大势所趋。这一活动最早是由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本世纪 80 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发表了《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全面提出了他改造与社会主义相关联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思想。戈尔巴乔夫把前苏联的停滞不前主要归结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即公有制、中央集权制、集体主义诸方面,企图通过私有化、多党制、多元化、个人主义等资本主义体制来进行改革。就改革的实际效果看,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经济发展并不乐观,今后的发展前景也十分渺茫。

这进一步说明,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改造不应通过全盘西化的方式来进行。因为西方资本主义方式也是一种片面性,不过是从另一个相反的方向即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否定方面来行事。前苏联、东

欧改革的失败,说明这种作法行不通。不尊重本民族的历史,不从本国的国情出发,任何改革都不会成功。同时,仅仅对原有体制进行修修补补,也不能解决问题。

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从根本上变革旧的生产方式,大胆吸收人类历史的一切积极成果,包括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积极成果,将亚细亚生产方式和西方资本主义体制分别具有的还有利于当今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克服各自的缺陷和不足,使之实现系统化和整体化,形成一种既扬弃“亚细亚生产方式”又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体制,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和体制的最优化。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中,就是要长期坚持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长期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使非公有制经济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对原有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

旧体制的根本变革,也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稳定

参 考 文 献

[1] [德]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3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2.

[2] [德]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6 卷 (上册)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3] [德]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9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3.

[4] [德]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5] [日] 池田大作. 展望二十一世纪 [M].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5.

[6] 俄国民粹派文选 [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3.

[7] [俄] 列宁. 列宁全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5.

(责任编辑 严 真)

Asian Production Mode& Social Stability

WU Zhi-jun

(School of Humanities,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W U Zhi-jun(1968-), male, doctoral candid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Mao Zedong’s philosophy.

Abstract Asian production has been able to bring to social’s over-stability therefore, when today emphasizing the social stability, some people talk about it again, holding that it’s the unique way to ensure social stability. Such a point, though discern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Asian production mode in keeping the social stability, fail to recognize that the stability resulted from the Asian production mode is a static stability, which can’t bring to social progress and therefore can’t be maintained for ever. The stability required by today should be a dynamic one, which is realized by transforming the Asian production mode fundamentally.

Key words Asian production mode; over-stability; social stability